

■大地之歌

天边,小柴旦

□马 行

司机老韩说：“肯定是一些废弃的土房子，没啥可看的。不过你要想去，咱就去！”尽管土房子仅一两公里远，老韩绕了一大圈却找不到靠近的路。我们只好下车，徒步前行。走近后，才知那确实是一些土房子。有十几排，不少已坍塌。有两条街道，街道两旁没有草，也没有树，空无一物。就在这时，我发现一间房子的烟囱上飘着若有若无的炊烟。我们惊讶不已，朝炊烟所在的房子走去。那房子有个小院，院墙不高，篱笆门虚掩。透过篱笆门，我看到房门上挂着蓝布门帘。我们正犹豫进不进院子，蓝布门帘一挑，有人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老人，他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我们是搞地质勘探的，正在湖上施工。”他邀请我们到屋里坐，说：“刚才听到院外有动静，还以为是女儿从西宁回来了。这地方，每年只来一个人，就是我女儿。”这时，他的老伴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跟着他俩进了屋，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住在这儿？”他说：“这里曾是秘密工厂，50年代建的。当时有三千多职工，我就是其中一员。”工厂解散后，职工们陆陆续续都走了，他却选择了留下。后来，他老伴也来了。如今，他已在此生活了四五十年。他说：“我是青海湟中人，妻子是湟源人。”我接着问：“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你俩是怎么生活的？”他把我们领到院子里，指着窗台上的小型太阳能发电板说：“这儿阳光充足，每天发的电足够照明，还能给收音机充电。”他边说边进了屋，拉了拉灯线，电灯亮了，又拧开收音机。

我接着问：“你俩吃什么？”他说：“我们每半个月出门采购一次食物。路线是这样，沿戈壁滩向北走6公里到公路边，搭乘从锡铁山镇发往大柴旦镇的长途汽车。长途汽车只有一班，上午到大柴旦镇，下午再回锡铁山镇。我和老伴坐这班车到大柴旦镇采购蔬菜和米面，一个来回120公里。”

他老伴指着桌子上的一个铁盆说：“那是中午要吃的青菜。”我走近一看，铁盆里放着蒜薹，数了数，共有7根。我问：“就吃这7根蒜薹？”他老伴笑着回答：“是的，足够了。”

这时，同行的人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回城里生活？”他说：“习惯了这儿，哪儿也不想去了。”他老伴也说：“习惯了这儿。”又有人问：“在这儿不孤单吗？”他说：“这儿没有孤单。”

第二天，电视台摄像记者虎子从山东赶到勘探队驻地。我对虎子说：“湖边隐居着两位老人，很神奇！”虎子一听，立刻来了兴趣，第二天一收工就让我带他去拜访两位老人。虎子一进院就连声感叹：“世上怎么有如此荒凉又神奇的地方？”虎子一会儿用摄像机拍，一会儿用照相机拍，一会儿又用手机拍。虎子对老人说：“你俩简直就是小柴旦湖边的两位老神仙啊！”

他老伴看了看天上的云说：“过会儿要下雨。”见她这么说，我和虎子跟着往天上看，只见白云朵朵，没有任何要下雨的预兆。然而，离开两位老人的小院不到半小时，那些又大又白的云朵全不见了，细雨悄然落下。

三

距离小柴旦湖不远，还有个大柴旦湖。不过，大柴旦湖并不大，水面比小柴旦湖小得多。大小柴旦湖之间，还有一个更小的湖泊。

有湖泊，就有丰美的水草。水草丰美处，栖息着成群的水鸟，有的有名，有的无名。这些水鸟是小柴旦湖的精灵。我每当路过那里，总能听到众鸟齐声鸣叫。那鸣叫整齐悦耳，似天籁。走近时，齐鸣声戛然而止。我想，众鸟肯定是发现了我这个闯入者，正在静观我的一举一动。如果再向前，鸟们就会从草丛和水面上飞远。飞至百米外，它们再次落下。这时，即便我大喊大叫、挥动双臂，鸟们也不再害怕。鸟们知道，停在百米之外是安全的。鸟们明白，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是必要的。

然而，尽管勘探施工特别忙，仍有工人动了心思，想逮几只水鸟吃。一天，卡车司机老杨在湖边溜达，发现几只孵化不久的幼鸟在水边游来游去。老杨见状，坏心眼就上来了：“既然有这么小的幼鸟，附近肯定有大鸟。”他就在水边使劲地赶幼鸟。幼鸟一阵乱扑腾，大鸟果然出现了。老杨知道大鸟不好逮，就一个劲儿地赶幼鸟。大鸟为了保护幼鸟，紧跟着幼鸟飞过来又飞过去。最终，大鸟累得飞不动了，老杨上前一把将其抓在手中。众幼鸟见大鸟被抓，想上前搭救却不敢，只能叽叽叫着。不知老杨能否听懂幼鸟的不安、请求与愤怒。

晚上，老杨把大鸟交给食堂，食堂的师傅却拒收，还劝老杨马上放生。老杨心想：“费那么大

劲逮的，怎能放掉？”第二天，老杨把大鸟关进一个纸箱，驾驶卡车出工了。刚进工地，卡车的车轮就陷进沼泽里。队上派救援车拖了两个多小时，不仅没拖出，反而越陷越深。老杨纳闷，自己可是老司机了，曾在东北松嫩平原的沼泽地开过两年卡车，再深的沼泽陷车都有办法将车拖出来，可在这里却束手无策。这时，老杨望着百米外的湖水，心头一惊，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连忙用车载对讲机联系勘探队驻地的同事，请他帮忙放掉纸箱中的大鸟。不可思议的是，大鸟一放，陷进沼泽的卡车居然被拖了上来。

大鸟与卡车的事，或许只是巧合。但我坚信，天地万物本是一体，一只鸟虽弱，但其所在的湖泊沼泽却蕴藏着不为我们所知的强大力量。几天后，我见到老杨，笑着问：“还逮鸟不？”他摆摆手说：“这小柴旦湖有点邪门，好多事物都特别精怪，再也不逮了！”

四

小柴旦湖的美，不宜用“美”来形容。因为一说“美”，似乎就把小柴旦湖说俗了。小柴旦湖的美到了极致，无论性格还是风格，都显得高冷。

小柴旦湖的水不是淡水，也不是寻常咸水，而是矿物质含量超高的盐碱水。它孤独，不愿被人接近。湖上施工的勘探工人，若是脸上、手上被湖水溅湿，会爆皮，有些工人就掉了好几层皮。若工衣沾上湖水，不一会儿就会留下一层白色碱垢。

那天，我乘橡皮船从湖北岸来到湖中央。这时，对面驶来一条橡皮船。船上的五六名工人，救生衣上渗着大块的白色碱垢，脸晒得黑亮。看上去，他们像一伙逃难的人。突然，船上有人在喊：“马老师，看我这儿，我是老刘。”我转身望去，看到有人向我招手。“我是老刘，现在还能背下你的诗歌。”他这样说，让我愣住了。我想：“这是谁？在这小柴旦湖上，怎么一下子扯到诗歌上了？”此时，两条船已靠得很近。坐在我身边的老人说：“嘻，这小柴旦湖上还有你的粉丝！”

待两条船挨在一起，喊话者右手一撑船帮，跳上了我的船。他自我介绍道：“我叫刘金德，原来是农场的农业技术员，现在是勘探队质检员，负责包炸药。我读过你的一本诗集，还能背下其中的一首诗。”说完，他提议一起拍个照。拍照后，他跳回自己船上了。

几天后，我在湖岸上又遇到了他。他大我几岁，烟台莱阳农学院毕业后，分到农场任农业技术员，管理养猪场和养鸡场。2007年，农场解体，他被分配到勘探队，成了一名勘探工人。他说：“我原来是干农业的，到勘探队后一无技术、二无特长，队上安排啥就干啥。”

我问他：“当农业技术员好呢，还是当勘探工人好？”他笑着说：“勘探工人确实苦，比如在湖面上，一天下来，少说也要工作十多个小时。若是到了浅水区，不能行船，只好穿雨裤泡在水中包炸药。”

他还告诉我：“小柴旦湖是冷水湖，湖面表层的水温有20多摄氏度，表层以下的水温却接近0摄氏度，相差了20摄氏度。常常是上半身被太阳晒得发烫，泡在水中的下半身却冷得瑟瑟发抖。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这个湖和这份工作。”

他很足智地说：“我一直有个文学梦，这小柴旦湖就是我要寻找的诗和远方。若不是当了勘探工，我可能永远无法来到这么偏远神奇的地方。”他一边说，一边把眼中看到的美景，用手指给我。

五

摄像记者虎子和我约好，抽空再去拜访湖边的那两位老人。拜访湖边老人，对我而言，相当于去寻访一个隐士梦。可直到湖上施工结束，我们一直忙于工作，也没能再去拜访。

湖上的施工任务接近尾声时，勘探队的文书武锋告诉我：“小柴旦湖区现在是无人区。在人类早期，这里可能很繁华，因为这里是青海西部仅有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在地，考古人员在湖边发现了百余件打制石器。我曾几次到湖边寻找，却一无所获。”

一天下午，我在湖边戈壁滩上行走，一低头，居然捡到一块红碧玉。那红碧玉尽管只有印章一般小，但色彩和质地极佳。或许，这红碧玉是小柴旦湖赠予我的礼物。

世间一切，皆是缘聚缘散。转眼间，我和勘探队离开小柴旦湖已近四年。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小柴旦湖在记忆中却愈发清晰。

小柴旦湖啊，它遥远如天边，却真实又亲切。它是孤独之湖，是生命之湖，更是时光与自然的隐秘对话。正是它，让我在勘探途中，找回了久违的宁静与力量。

新天

淡绿色的告别

□吴师羽

2025年4月26日，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距离杭州电报业务永久关闭还有4天。在武林广场电信大楼，我叩响了电报室的大门。恒河沙数的数据与信息在我周遭川流，我递上了8张填写完毕的电报纸，纸张粗糙，格线淡绿。所有的数据在此刻都暂时变得无关紧要，一条在杭州无声绵延、名为“电报”的长河流向了它的尽头。而长河边的人们从各处赶来，朝着河的上游投下一眼回眸，然后用嘀嗒的电码与粗糙的方格纸，向一个自1883年始绵延了一百四十二年的通信时代，投递最后的淡绿色的告别信。

我的启程完全出于偶然。朋友比我更早知晓了电报业务停运的消息，在我启程动身的前一天，将寄给老师的电报错误地发送到了一个早就不再用的地址，况且电报的内容也欠考量。于是朋友便托我在电报发出之前，将那封电报撤回。

我没有理由不答应。至于应该怎样去撤回一封电报，又应该怎样去发报，我都完全没有考虑过。

出地铁口，便可以看到电信大楼硕大无比的蓝绿色落地窗以及彰显自己身份的电信标识——在旁像是勋章一样排开的“数字生活体验中心”几个大字。从落地窗到电信标识，从建筑的皮肤到建筑的内脏，一切健硕，敞亮，新陈代谢旺盛。找业务员询问时，“电报”二字刚出口，业务员便熟稔地指向通往二楼的阶梯。

我左拐上了二楼。相隔几面墙壁，外面

有工作人员正在向客户推销搭载了新芯片的手机。身前左右都是业务室，“光纤”与“宽带”的关键词从业务室的门缝里滑出。我的前方象征了一个普通人能接触到的信息传递速度与效率的极限，而电报则被落在身后。

电报的业务室和发报室蜷缩在一个小角落里。一间小房间用于业务员清点字数，收钱找零；而电报发出的地点则在小房间隔壁，更宽敞些的办公室。办公室外休息区的几张桌前，早已有些更早到达的人，对着一张淡绿方格发信纸填写信息。桌上立着相当醒目的告示：电报业务量激增，为保障您的紧急通信需求，建议优先选择电话、视频通话等即时通信方式。工作人员也在提醒，这会儿的电报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送达，而电报能收到的地址，被限制在了浙江、山东等地。这意味着若要寄到其他地方，还需要人工转寄。

暂时绕过奋笔疾书的人群，叩响发报室的门时，老电报员从清点字数的小房间走出，带我打开了发报室的门。

“电报需要撤回去？”老电报员问我，我点了点头。朋友记忆中老师的地址，早就在此前变成了商业综合体的一部分。

老电报员将墙边的暂存柜打开，垒成三垛如小山一般的电报发信纸几乎要倾倒下来。老电报员将其用手扶正，随即取下一垛发信纸，确认了我的身份以后，开始翻找原先寄出的那封信件。电报员找发信纸的间隙，我抽开视线环顾了一阵，发报室内并没

有看到电报机，于是目光又重新回到信纸本身。老电报员翻找的速度极快，电报纸上的字迹从他的手指之间迅速流走，偶尔能从影子间捕捉到几串文字，譬如“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譬如“西子湖畔的晚霞”，譬如高频出现的“纪念”。

老电报员终于抽出了需要重新投递的发信纸。我便回到外面取了新的发信纸，开始动手填电报信息。填电报并不复杂，自信件发明以来的收发逻辑被沿用，淡绿色方格纸上的大部分信息都并不需要自行填写，只需填清收、发件人的住址、姓名等，再写明正文便可。

我对电报的所有记忆几乎都停留在文艺作品之中。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电报承载的都是最紧急的消息。时过境迁，“十万火急”终于也慢了下来。但哪怕是在最后的时日，电报依旧延续了它同等的慷慨与吝啬。收件人与正文都是一格一字，一字0.14元，无论是多么重要的内容，也只能在50个方格以内阐明。

填完了给朋友们的电报以后，我决定将最后一封电报发给我自己。

“复杂的漫游”，我这样写给自己。就纪念而言，我想这5个字能承担得起电报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重量。

回到业务室，业务员逐一清点了每一张发信纸的字数。425个字，59.5元。所有的发信纸也都被摞成一摞，标上了编码，等待被电报员发出。在办完发报业务以后，我又在发报室的门口坐了一小段时间。日头渐

高，来电报的人几乎像是电报塞满暂存柜一般地塞满了发报室，人头攒动。

我在网上查到了此前收到电报的人展示的照片。不过是一张A4大小的纸，喷墨打印上了电报所该有的那些内容，与之前的电报的形制早已是两股模样。现在的样式更像是用Word的样式将发信纸上的内容再度转录。但这并不影响人们陆陆续续地到来又离开，发送一串似乎无关紧要却又弥足珍贵的文字。我想，在手机移动网络都停止运营的某一天，是否也会有一群好事的闲人，聚在一起打一个无关紧要的电话，发一条无关紧要的短信？

在离开之前，我又拿走了一张空的发信纸，和手机一起放在包里。我并没有打算在那张淡绿色的发信纸上填任何东西。我将把它和寄给自己的电报放在一起，作为时光的锚点，让我在某个时刻，用一张淡绿色的发信纸筑起在场的实感。

报纸在2025年4月30日，也就是杭州电报业务停止运营的那一天，刊登了电报业服务结束的消息。在最后一天，一共有5846封电报被存进了那个小小的电报暂存柜里，等待着被发往各处。正如所有人在发报时所知晓的那样，这些电报由于发报量激增，都会延迟到达，但没人在乎。或许有一天，会有哪个好事者将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杭州最后的那数万封电报一一集齐。至于集齐的数万封电报里，会有怎样的不超过50个字的呓语，以及删了又重写的思念，似乎无法一一言说。